

想像的共同政策-日本及南韓對北韓政策的同床異夢

(2012-2019)

張娟瑄*

摘要

日本、南韓為美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同盟夥伴，同處第一島鏈前沿，共同面臨北韓的武力威脅。惟由於兩國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歧異—南韓相較日本對北韓的「威脅認知」較低，在北韓情勢緩和初期及緊張僵局時，其傾向採取積極和緩政策，尋求兩韓「共同利益」，藉機提升區域影響力；相反的，日本則會在北韓情勢緊張初期及和緩僵局時，採取強硬政策，尋求提升日本安全防衛能力可能。日本、南韓對北韓認知及作為差異性，導致其面對金正恩上任後加強核武及導彈發展造成東北亞安全情勢緊張下，政策的協調及一致性未隨之提升，形成在美國安保體系協調下之「想像的共同政策」(imagined common policy)。

關鍵字：威脅認知、聯盟理論、日本與北韓關係、南韓對北韓關係、北韓核武政策

*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生；通訊作者，電子信箱：s987132@gmail.com

Imagined Common Policy: Same Bed with Different Dream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North Korea's Policy (2012-2019)

Chuan-Hsuan Chang^{*}

Abstract

Bo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US security alliance partners in Northeast Asia, locate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facing North Korean military threats. However, both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North Korea's "threat awareness" and "common interests". For example, South Korea's perception of North Korea's threat is lower than Japan's. When North Korea's situation eased at the early stage or tensed in the deadlock, South Korea tended to adopt a proactive mild policy, sought both N.K. and S.K.'s "common interests,"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nhance regional influence. Conversely, Japan adopted a tough policy and sought to improve its security and defense capabilities when facing North Korea's initial period of tension and moderate stalemate. Such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led to no improvement in their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nsistency when they confronted Northeast Asia's tense security situation resulting from Kim Jong-un's intensified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Such differences also resulted in "imagined common policy," which was produced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US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threat perception, theory of alliance, Japan-S.K. relationship, S.K.-N.K. relationship, North Korea nuclear policy

*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ting a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987132@gmail.com

壹、前言

針對聯盟形成因素，現實主義認為可分為「權力平衡」、「威脅平衡」、「利益平衡」三類。其中，所謂「威脅平衡」形成的聯盟，係指國家彼此考量共同外在威脅後，選擇以結盟方式強化防衛力，盼藉此抗衡共同安全威脅。

由此觀點來看，同處美國安保體系及北韓核威脅下的日本與南韓，理應基於「威脅平衡」因素，建立緊密連結。申言之，日本及南韓倘是基於「威脅平衡」建立聯盟關係，那雙方對北韓核武政策的協調應可隨北韓安全威脅升高而有更高的協調性。

惟觀察北韓自 1997 年開始研發核武以來，尤其 2011 年 12 月 17 日金正恩就任北韓領導人後，北韓在核武與導彈研發技術的進步，並持續以言語威嚇美日及南韓等國家，導致東北亞區域不穩定升高的情勢下，日本與南韓在北韓政策的協調性卻未隨之提升。例如 2017 年年底前北韓持續試射洲際導彈及進行核試驗下，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及南韓等國家對北韓實施「極限施壓」政策，而南韓政府卻積極推動與北韓重啟對話，呼籲國際考慮調整對北韓的制裁，日本政府則依附美國堅持對北韓「極限施壓」。雙方的北韓政策形成一種在美國安保體系協調下之「想像的共同政策」(imagined of common policy)——本文所指的「共同政策」非指達到如歐盟此類超國家國際組織，由各成員國共同簽訂條約讓渡部分國家主權，在追求彼此共同利益下，透過正式程序協調出需共同遵守、具拘束力的政策(藍玉春，1999)；而是指雙方因現實環境存在共同利益或挑戰，致使雙方考慮透過合作、協調，在政策上取得一定程度之共同性，以應對相同問題或追求相同利益。

從扮演協助政府擬定政策、具有官方色彩的日本、南韓政府智庫學者研究來看，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戶崎洋史(2016)認為，日本倘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對北韓威懾政策只能附屬在以美國為主導之美日及南韓軍事協調合作，透過三方協調加以落實。南韓統一研究院研究員李奇泰(2019)則主張南韓可對在日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中提供功能性協助。則可進一步看出兩國對北韓政策的「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判定不同，其看法亦可在政府決策中見到端倪。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日本及南韓之所以無法在應處北韓核武政策上形成穩定聯盟關係，關鍵在於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不同。而導致日本與南韓認知不同的原因，包括兩國對北韓關係基本定位之差異性、彼此區域戰略地位期待不同等。

鑒於金正恩上任後，先加大對外武力威脅升高緊張情勢，近期又重啟對美談判緩和局勢，韓半島情勢波動劇烈，日本與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協調亦有諸多變化。爰筆者擬觀察 2012 年後北韓核武等對外武力威懾提高下，日本及南韓對北韓政策的協調有否隨之改變？再進一步與現有理論對話，分析日本及南韓對北韓之「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為何？兩項因素對日本、南韓在北韓政策有何影響？隨著北韓情勢緊張或和緩等變化，兩國在「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歧異會對彼此的北韓政策上產生何種競合樣態？又會使美日及南韓在北韓政策上形成怎樣的關係？

貳、文獻回顧

一、聯盟理論

(一) 聯盟成因

國際關係理論之新現實主義認為，面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各國須以自助方式，保障本國安全與利益。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主張的各國依權力大小對抗，新現實主義指出，國家會採取結盟方式應對威脅及追求本國安全利益，即建立所謂「聯盟」(alliance; Waltz, 1978)。綜整新現實主義學者有關聯盟成因的論述，可分為三大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 (整理如表 1，陳麒安，2008)。

主張聯盟組成主要是國家行動者追求「權力平衡」的學者認為，國家為保障本國安全及利益，會透過結盟方式，以維持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而所謂「權力平衡」一包括尋求某種期望的情勢、維持現狀、保持均等的權力分配、追求其他型態的權力分配等情形(Morgenthau, 1985)。從 Holsti(1988)所指「結盟是因為國家能力無法維護國家利益、應對外侮，因而促其與據共同利益者結盟」反推，當國家本身力量足以應對外侮或結盟成本過高時，國家則不傾向結盟。

其他學者認為，國家結盟的因素不能全以「權力平衡」概括，認為避免遭受安全等威脅，亦為國家選擇結盟的因素之一；申言之，本國結盟選擇，關鍵在他國對本國意圖，而非僅依據他國能力強弱區分(Waltz, 1987)。例如二戰期間，英國為避免德軍入侵威脅安全，選擇與美國結盟對抗，此結盟成因為「威脅平衡」，國家會採取結盟對抗他國安全威脅或依附他國避免引發安全威脅(Snyder, 1990)。

另有認為，若多以「威脅平衡」作為成因，恐對案例描述失去精確性，提出國家結盟的因素在於追求「國家利益」，即基於「利益平衡」之結盟(Mearsheimer, 2001)。此派認為，國家是否結盟的關鍵考量因素在於本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權衡，並以此選擇是依附強權獲取國家利益，或與其他國家結盟制衡以保障國家利益(Schweller, 2004)。

除了前述基於物質面的結盟成因外，另有學者點出「意識形態」(ideology)聯盟成形亦具有關鍵影響因素。例如信仰共同之意識形態下，需付出意識形態義務；意識形態接近的國家彼此較不會相互征伐，且會合作捍衛共同意識形態，彼此結盟亦有助強化其在國際之正當性等(Walt, 1987)。惟部分學者強調，物質因素對聯盟成因的影響遠高於非物質因素的意識形態，換言之，意識形態可視為是「聯盟」之黏著或剝離劑(Mearsheimer, 2001)。

表 1
新現實主義有關聯盟成因之討論

因素	成因	重要學者	定義
物質	權力平衡	Morgenthau (1985)	若干國家追逐權力，各自試圖維護現狀或推翻現狀，勢必導致所謂權力平衡的態勢和旨在維持這種態勢的政策。當國家為了追求權力，但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實現其目標時，便會考慮與其他國家聯盟合作。(依附強國)
	威脅平衡	Walt(1987)	國家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力大小」來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聯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抗。
	利益平衡	Schweller (1996)	國家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依附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
非物質	意識形態	Walt(1987)	相同意識形態國家較不易發生戰爭，彼此意識形態類似國家之結盟有助國強化在國際社會之正當性。惟儘管物質因素為聯盟主要成因，但意識形態有助強化/削弱結盟強度。

(二) 聯盟瓦解

Liska(1962)指出，結盟存續的關鍵除兩結盟國彼此「共同感」(sense of community)之強度，結盟的成本效益亦為重要關鍵，畢竟加入同盟的另一層面是國家政策自主性的受限。Morgenthau(1985)認為穩固聯盟的利益應是具體、有限的利益。Waltz(1987)則擴大將戰爭獲勝之利益分配、共同敵國威脅下降、聯盟國內政紛擾等均列為聯盟瓦解之可能因素。

惟就共同敵國威脅下降導致聯盟瓦解解釋，由於因冷戰成立的北約組織，未因蘇聯崩潰而瓦解，新自由主義學者對此批評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忽視了「國際制度」之影響，關鍵應是制度本身的功能性決定聯盟的持續性(Keohane, 1988)。

Walt(1997)重新修正導致聯盟瓦解因素指出，包括對威脅認知改變、盟國彼此信任度、國內政治壓力等都可能使聯盟不因共同威脅消失而瓦解，但相反，若共同威脅仍在，聯盟彼此也可能因前述三個因素而提前瓦解。

(三) 威脅認知 vs. 共同利益

針對前述理論指出，影響聯盟成型或瓦解的關鍵之一為雙方是否有共同威脅或有共同利益，學界對此有另外的討論。

首先，威脅牽涉到雙方對威脅的認知，即「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即受威脅國對威脅方行為的解讀，換言之，此為一主觀心理推論(Knorr, 1976)。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此主觀心理推論，存在因決策者無法避免的認知侷限產生錯誤認知，而誇大另一方敵意，導致威脅認知產生，再影響到其行為。楊雯婷(2017)從政府決策觀點切入，提出「威脅認知雙層構造」，指出一國的「威脅認知」是在國內社會及決策者個人主觀認知下形成的「雙層認知結構」，而非決策者片面的認知可壟斷。另有學者分析影響威脅認知的外部變因指出，雙邊倘有共同的「認同」(identity)將可減少彼此對威脅的認知，亦即某方本身的政治文化、宗教等背景，會影響其對另一方威脅之認知；此外，而若一國在軍事力量提升處於劣勢，則會導致其「威脅認知」升高(Rousseau & Garcia-Retamero, 2007)。

從學者觀點來看，日本、南韓雖同處北韓的安全威脅下，但雙方在民族、文化導致的社會認知差異，例如南韓在意識到北韓威脅同時，亦與其有共同之民族認同等，進而影響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之差異。行動者的行為除受到威脅認知的影響外，雙邊認為的「共同利益」歧異，亦會牽動行為者的行動。

所謂「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則牽涉國家彼此結盟所能獲得之利益、權利等，主要屬物質因素(王逸舟，2002)。部分學者以「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兩項因素，分析國家的行為選擇及兩國間安全合作可能性，如在兩國對彼此「威脅認知大、共同利益多」或「威脅認知小、共同利益少」情況下，雙方傾向採有限合作；而「威脅認知仍大、共同利益少」時，雙方不傾向合作；「威脅認知小、共同利益大」則最有利雙方合作(楊恕、王樹森，2018；李昭賢，2018)。

針對北韓議題部分，西方及日本學者傾向將「日本及南韓合作應對北韓威脅、維護雙邊安全」視為雙方「共同利益」，認為北韓緊張情勢的升高將會提升兩國的安全合作(Sakaki, 2019；Tosaki, 2017)。南韓學者則視「抗衡北韓安全威脅為日本及南韓共同利益」，更傾向將「南韓可利用促北韓與各方和談提升其區域影響力」看作其利益(Lee, 2019)。換言之，日本、南韓就北韓議題的「共同利益」並非完全一致。

二、小結

從理論來看，影響同盟關係穩定與否因素包括一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不同、彼此有不同利益思考、國家社會輿論及決策者主觀認知、聯盟之國際制度成熟等。

筆者觀察日本與南韓的北韓政策，認為導致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分歧，難形成穩定政策同盟之主因為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歧異。為驗證此假設，筆者進一步分析雙方認知上存在何種差異性，及造成差異的原因。自變因設定為日本與南韓內部因素之一「對北韓核武議題認知威脅差異」及「對北韓共同利益期待」；依變因為「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不同」(研究架構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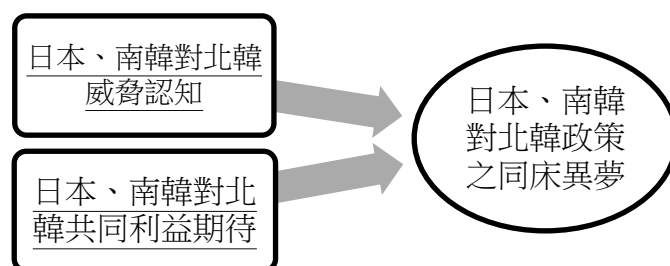


圖1 研究架構

依變因分析包括日本及南韓在對北韓核武政策上不同，此部分從日本及南韓官方文件、領導人及官員有關北韓核武政策發言及立場作為。自變因部分，筆者從內外環境分析日本與南韓會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為何出現歧異，進而導致雙方北韓核武政策的「同床異夢」，筆者認為，由外到內因素可包括北韓本身對日韓威脅強度與頻繁度、日韓關係、日韓地緣戰略利益考量(安全預期心理或利益期待)、日韓執政黨政策偏好、日韓領導人性格及政局穩固等。其中，「戰略利益考量」與「政局環境」又為主要影響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立場的因素，牽制兩國在北韓核武的合作可能性。

此外，針對可能的區域外國際影響力部分，筆者認為，儘管日本與南韓因分別與美國形成安保同盟，加上美方對兩國的軍事及外交政策均具一定影響力，雙邊政策的合作一定程度須考量美方態度。惟，考量冷戰後、911 事件等重大情勢變化，致美方相對東北亞安全更關注中東區域情勢，故倘北韓非嚴重威脅美國本土安全或其與兩方之安保同盟下，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合作與否仍主要取決兩國各自政策之影響—即兩者對北韓的「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

參、實證分析

本文研究目的為探討日本及南韓對北韓「威脅認知」之看法，爰以金正恩上任以來的核試、導彈/火箭炮試射等數量變化作為威脅程度高低判准(如圖 2)，並分為三個時期，觀察這三段時期日本、南韓政府對北韓核武政策的看法。以下各節依不同時期的北韓威脅高低、日本及南韓對北政策、導致日本及南韓政策差異因素，分別介紹之。

一、北韓威脅程度偏低期(2012-2013)

(一) 北韓情勢

2011 年 12 月 17 日金正日過世，北韓領導人由其子金正恩接任，惟金正恩面對的執政環境與前兩任領導人有極大差異，導致其在作為上出現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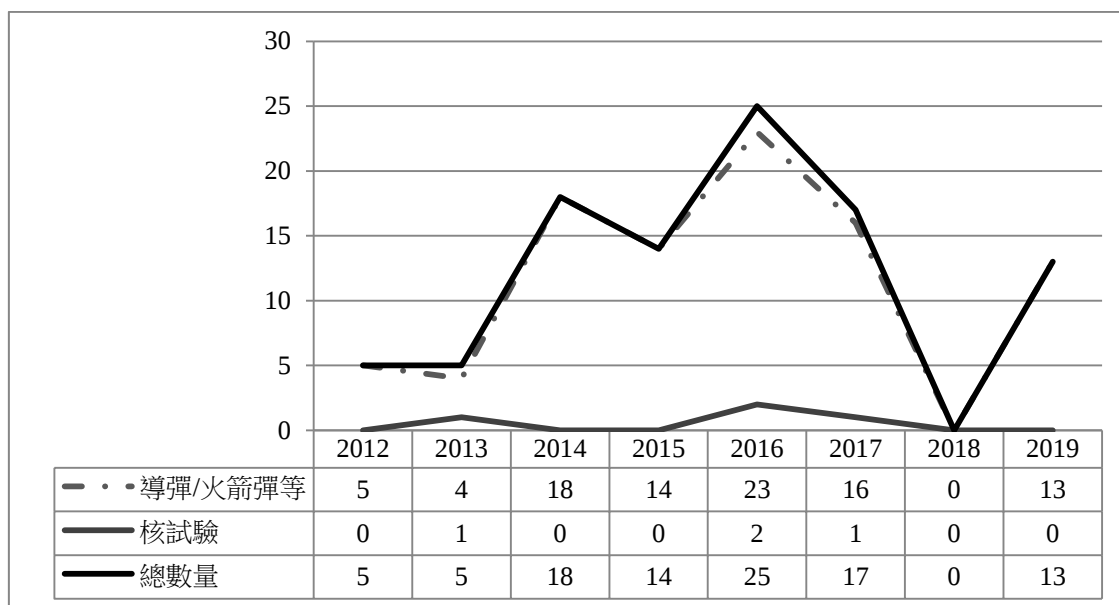


圖2 金正恩上任後核試驗及導彈/火箭彈試射情形(2012-2019)

資料來源：Nuclear Treat Initiative(NTI)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cns-north-korea-missile-test-database/>。圖為作者自製。

內部環境上，首先，由於金正日在 2000 年左右對原本屬意的接班人選金正男作為不滿而改立接班人，並要求出國留學多年的金正恩返國準備接班。惟金正恩直至 2010 年 9 月才獲得重要黨職，提升黨內接班地位；但金正日 2011 年底即逝，金正恩實際接班準備期僅約 1 年多，相對金正日時間短，第二，金正恩並未與父親金正日具有同樣培訓歷程—即長期在國內、黨內訓練。第三，金正日為幫助金正恩政權穩固，安排其姑姑金淑姬與姑丈張成澤等前朝重臣輔佐其繼任，對其完全統治產生掣肘(張娟瑄，2019)。

國際環境部分，金正恩原本期待中國大陸領導人可以到訪北韓(張少文，2013)，凸顯中國大陸與北韓的血盟關係，協助其穩固國內政權，但陸方則考量到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調整，對北韓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外交政策，強調與北韓為正常國家關係(中國大陸外交部，2013)，並與美日及南韓等國維持良好外交關係，因此不斷降低與北韓高層外交程度與頻率。此外，又加上北韓鑒於利比亞領袖格達費放棄核武與西方談判而遭政變的案例，以及美日及南韓對北韓軍事威脅隨北韓挑釁增加而強化。

受到國內外壓力齊發下，金正恩除對內肅清政敵外，亦開始透過核試驗及不斷提升核武及導彈技術，藉以鞏固內外形象與地位穩固。從金正恩歷年的職稱變

化及關鍵重臣張成澤 2013 年 12 月 12 日遭處決來看，金正恩直到 2013 年底，黨內領導地位才逐漸基礎穩固地位。

（二）日本態度

第一時期(2011-2013)中，由於日本政府出現輪替，因此個別分析兩任政府的北韓核武政策。

首先，2011 年 12 月 17 日金正恩上任後至 2012 年 12 月下旬前，為由日本民主黨野田佳彥擔任首相期間。其初期政策(2012 年以前)傾向與中國大陸尋求合作解決北韓問題，如在金正恩甫上任之初即訪中會晤時任中共總理溫家寶，促請中方勸說北韓及表達盼恢復六方會談(日本外務省，2011；中國大陸外交部，2011)。惟 2012 年後，隨著北韓數度試射火箭(4 月 13 日、12 月 2 日)等升高挑釁作為，野田政府因國內不滿對北韓政策過軟下，政策轉趨強硬，除向北韓提出強烈抗議、與美方加強溝通外，亦表示將與各國聯手強化制裁方案(BBC, 2012)。

2012 年 12 月 26 日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接任，其北韓政策一度操作兩面手法，一手強硬支持安理會對北韓 2012 年 12 月的發射人造衛星進行制裁、同意美方增加在日本境內的雷達設施、於周邊海域部署驅逐艦防範(Burke, 2013；Dudley, 2013)；另則於 5 月 14 日派遣特使飯島勲嘗試緩和日本與北韓關係。惟隨著北韓挑釁持續升高、美方施壓日本對北韓政策與其一致等(BBC, 2013)，安倍政府最終在北韓政策上轉趨強硬。

（三）南韓態度

金正恩第一時期南韓同樣面臨政權交接，惟南韓為同一政黨執政。2013 年 2 月 25 日之前的李明博治理期間，當時兩韓關係因李明博的北韓政策引發平壤當局不滿，雙方關係降至冰點；李明博並於 2012 年 1 月初—金正恩接任之初，訪中尋求雙方在北韓政策之共識(韓國中央日報，2012；中國大陸外交部，2012)，惟首先是金正恩上任不久南韓即面臨大選，李明博面對任期尾聲，無意有積極作為；另方面則因兩韓關係不佳，南韓亦難有操作空間。整體來看，李明博與金正恩任期重疊期間的北韓政策，並沒有積極、明顯作為。

2013 年 2 月 25 日朴槿惠接任後，其北韓政策相對李明博和緩，惟北韓仍認為此僅是李明博政策之翻版，雙方關係無改善徵象，南韓操作空間有限。面對北韓持續挑戰，朴槿惠最終仍增強與美國軍事合作(Landler and Sanger, 2013)。

(四) 小結

比較第一時期日本、南韓對北韓政策的態度，兩國雖同樣一方面在金正恩上任初期即訪問中國大陸，盼尋求中方抑制北韓作為；另則嘗試對北韓釋出善意，期待其緩和核武研發等挑釁政策。惟隨著金正恩持續挑釁，日本及南韓開始尋求國際管道，包括支持安理會制裁、與美加強軍事合作、呼籲國際施壓北韓等方式，對其政策轉趨強硬。

雙方的北韓政策走向雖相近，惟雙方橫向聯繫、協調程度相當低；換言之，無論是日本及南韓與美、中國大陸與北韓就朝鮮半島問題協調形成的戰略三角(如圖 3 所示)，均是呈現羅曼蒂克三角或單位否決型(Dittmer,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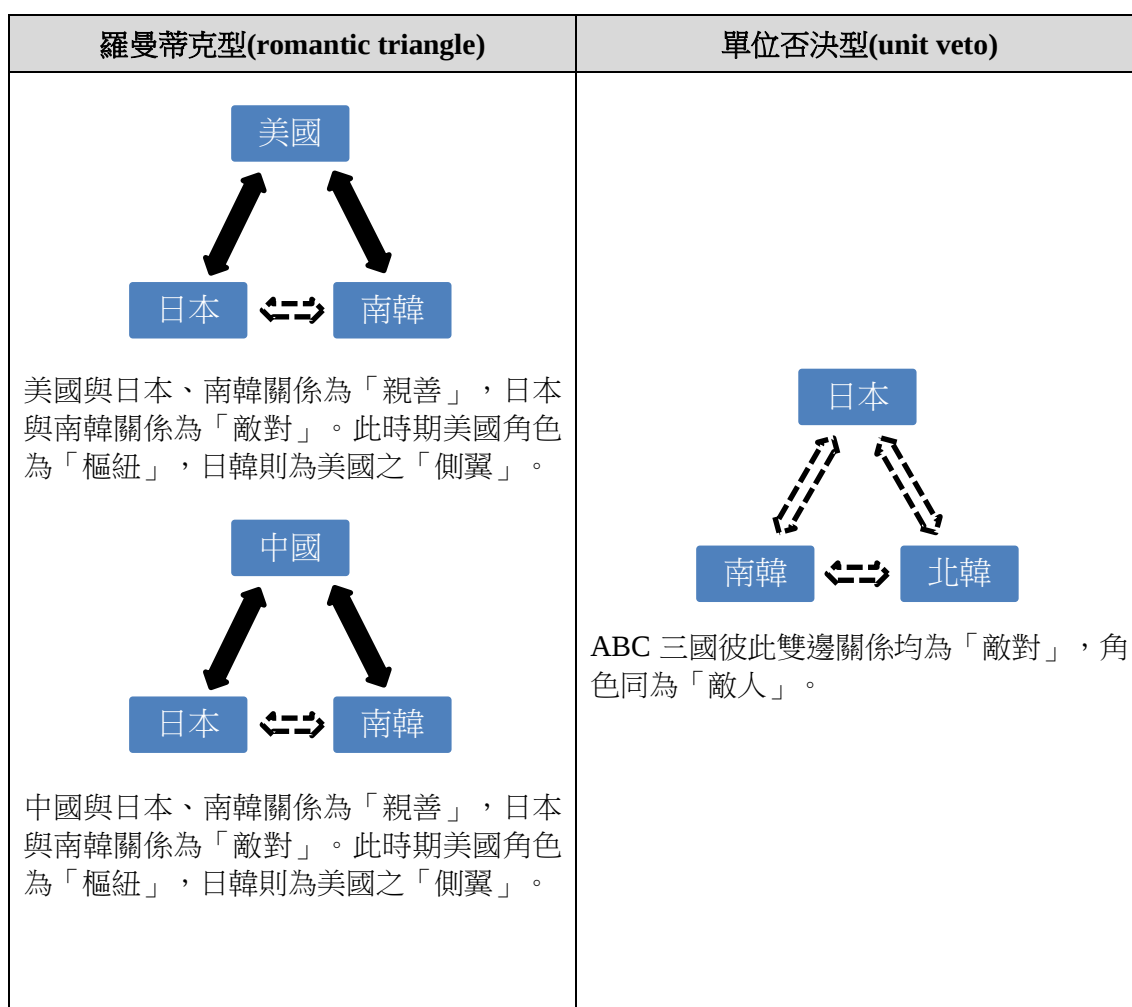


圖3 日本與南韓分別和美、中、北韓就韓半島問題協調形成之戰略三角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正自吳玉山(1999)。

影響日本及南韓此時期就北韓核武政策橫向聯繫偏低因素，從雙方對北韓核武等挑釁作為的反應來看，日本及南韓均感受到北韓安全威脅，「威脅認知」並非影響其無法結盟主要因素。

相對的，考量 2011 年 8 月李明博在南韓國內壓力下提出慰安婦歷史問題、隔年 8 月登上獨島/竹島、2013 年 2 月日本再舉行「竹島日」紀念活動等，致使日本及南韓關係急轉直下發展顯示，日本及南韓無法對北韓核武威脅形成同盟之關鍵受制於雙方國內因素，且主要在內部民意壓力。即雙方在北韓問題上雖有相近的「威脅認知」，但由於日本及南韓關係惡化，合作應處北韓問題無法成為雙方之「共同利益」。

二、北韓威脅程度升高期(2014-2017)

(一) 北韓情勢

2014 後，隨著金正恩權力穩固後，其開始加速發展核武及導彈技術，挑釁次數快速攀升。在 2014 至 2016 年中，北韓著重在導彈技術研發；2016 年後則開始強化在核試驗上。

在 2014 至 2017 年間，北韓對外挑釁作為除相對金正恩就任初期呈現超過 3 倍的挑釁次數，其核試驗更進入氫彈試驗階段，核武及洲際導彈技術漸趨成熟，對日本及南韓及雙方共同盟友—美國之國土安全均造成高度威脅。其中，2016 年宣稱成功的氫彈試驗更促各方開始就北韓問題上升高協調力度。

(二) 日本態度

面對北韓急速升高的核武技術及飛越日本本土或落入日本經濟海域的導彈試射，均在在升高日方對北韓安全威脅之認知。安倍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後，安全政策採取「積極和平主義政策」，包括在 2013 年底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確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通過新的「防衛大綱」(原鄉城治，2014)。透過此一系列操作，安倍強化美日同盟關係，用以應對北韓核威脅及中共軍事力量提升。

而北韓 2016 年後的三度核試射，安倍政府發言立場持續升高譴責力度，從 2016 年 1 月核試強調此為重大威脅，到後來明確稱核試係對日本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嚴重損害地區和國際社會和平安全，決不會容忍(日本首相官邸，2016)。

在國際實際作為上，2016 後日本一則持續強化與國際協調，支持安理會通過更嚴苛的制裁案，呼籲完全落實安理會決議，應對北韓「施加最大壓力」，一再

重申北韓應「完全無核化」。再則與美方強化軍事合作，增加購買軍武，升高軍演規模及強度，配合美方推出其他制裁方案，加強北韓周邊海域走私等，強化對北韓施壓。最後，除在美國協調下強化美日及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並開始單獨與南韓領導人、國安會首長通話，協調對北韓政策(詳見表 2)。

表 2

2016 年後日本、南韓領袖、國安首長、外長就北韓問題加強會晤情形

年度	2016	2017
會晤情形	●3/31 日本及南韓美領袖峰會 ●8/4 日本及南韓美六方會談代表電話會談	●2/16 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2/28 日本及南韓美六方會談領袖會議 ●3/6 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3/6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4/5 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4/28 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5/14 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5/14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5/21 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5/29 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5/30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7/4 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7/29 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7/29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7/31 日本及南韓美領袖會晤 ●8/7 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8/25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8/29 日本及南韓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8/29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8/30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9/3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 ●9/4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9/7 日本及南韓外長會 ●9/7 日本及南韓領袖會 ●9/15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9/15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11/29 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11/29 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11/29 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次數	●日本及南韓美：2 次 ●日本及南韓：0 次	●日本及南韓美：9 次 ●日本及南韓：20 次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p/page24_000694.html。表為作者自製。

在內政作為上，日方甚至在二戰後再次觸發防空警報及舉行防空演習等(BBC, 2017)，升高國內對北韓威脅之警覺。總地來看，此一時期，日方對北韓核武的「威脅認知」顯著提升，日方並開始與南韓政府協調對北韓政策。

(三) 南韓態度

2013 年後，隨著北韓威脅的升高，朴槿惠政府雖在對北韓政策上加強與美方合作、升高對北韓的反制；惟仍試圖透過舉行高層會談(2014 年 2 月 12 日，南韓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奎顯、北韓勞動黨統戰部副部長元東淵)、離散家庭團聚(同年 2 月 20 至 25 日)等，盼緩和兩韓緊張關係(韓聯社，2014)。

然而，2016 年 1 月北韓再起的多次核試驗及導彈威脅，韓方一方面面臨來自美、日等盟友的安全合作壓力，另方面其亦感北韓威脅升高。

南韓同樣支持安理會通過相關制裁決議，並與美日合作查禁走私、落實制裁；另亦升高美韓軍演強度，增加向美購買武器。韓方並在美壓力下，於 2016 年 11 月同意與日方簽署「日本及南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2016 年 7 月更在中方反對且未與中方事先溝通下，正式宣佈將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

其後，朴槿惠雖面臨彈劾壓力，並於 2016 年 12 月遭彈劾下臺，惟其最後任期內及代理總統黃教安，對北韓政策仍是在美方協調下與日方合作，政策維持強硬。

2017 年 5 月 10 日，南韓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屬於左派的文在寅，有意對北韓採取 1998 至 2008 年金大中、盧武鉉的「陽光政策」，主張與北韓對話，進行外交談判，並推動聯合經濟項目的緩和兩韓關係。

儘管南韓的北韓政策一度因北韓 2017 年再度核試及持續導彈試射等挑釁，文在寅稱將持續與國際合作嚴懲北韓，並持續強化與美、日協調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惟文在寅仍嘗試與北韓溝通，甚藉舉辦平昌冬奧機會，對北韓釋出共同出場、促成兩韓高層會晤等緩和雙邊關係善意(韓聯社，2017)。

比較朴槿惠與文在寅對北韓政策，雙方雖均盼緩和與北韓關係，惟一方面因平壤當局對朴槿惠右派政黨政策不信任，相對更願意與左派的文在寅政府談判；另方面因朴、文政府對美國與北韓的政策走向不同，朴槿惠立場相對「親美遠朝」，而文在寅則傾向「友美親朝」，並有意建立對北韓政策主動性。故在面對

北韓威脅仍高情況下，文在寅政府相對有耐心亦有利基促北韓調整政策，進而開取得 2018 年後在區域地位的外交地位優勢。

(四) 小結

比較第二時期的日本及南韓在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隨著北韓核武威脅的升高，雙方除在美方的協調下強化合作，日方亦主動主導與南韓互動。此時期，日本及南韓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均升高，雙方並維護國內及區域安全成為兩國「共同利益」，故日本及南韓不但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共識，以減少雙邊分歧，並同意成立「和解與治癒基金會」，並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從另一角度看，儘管此時期日本及南韓民眾均不滿雙方政府在慰安婦議題達成之共識，惟鑒於北韓安全威脅的急速惡化及美方加強協調下，不滿情緒尚不致影響日本及南韓在北韓政策之合作，日本及南韓關係明顯轉好。

隨著南韓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後，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政策之協調面臨來自南韓領導人及其政黨主觀認知，與金正恩對南韓新政府期待而願調整政策等影響因素升高。故，一方面文在寅就任初期面對北韓挑釁未歇，卻仍因其個人認知及政黨傾向，堅定主張與北韓對話、談判，緩和兩韓關係，形塑兩韓一體民族氛圍等。平壤當局也在 2017 年年終時回應南韓善意，兩韓關係出現似緩和曙光。惟此時期，情勢轉變仍僅限於兩韓，尚未擴及北韓對美日之政策調整，故美日仍堅持對北韓實施極限施壓政策。

此一時期，隨著北韓情勢的不斷拉高，且有持續升高可能，尚未見和緩徵象時，日本與南韓對北韓的政策協調性也隨之升高。惟隨著情勢緊張陷入僵局，各方均不願退讓時，南韓開始轉向對北韓釋出善意，以避免區域情勢真的走向戰爭，日本及南韓對北韓的「共同利益」分歧開始變大，雙方合作已有從高點開始下滑徵象。

三、北韓威脅程度轉低期(2018-2019)

(一) 北韓情勢

2018 年初兩韓關係緩解，金正恩於新年講話中強調，北韓已完成核武建置；同年 4 月的勞動黨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再次指出北韓核武已完成，未來核試驗及中長程導彈之試驗已不需要，接下來將重視經濟重建工作。

在 2018 年一整年中，北韓停止核試驗及導彈試射，並與韓、中、美、俄等國領袖會晤，營造韓半島情勢已緩和氛圍。惟 2019 年後，隨著美國與北韓談判陷入僵局，北韓再起火箭彈試射，惟除威脅作為之程度已相對過往克制，北韓亦保有談判空間。

（二）日本態度

安倍政府在第三階段的北韓政策出現三度立場變化—第一階段，在 2018 年中前期前，包括兩韓峰會順利舉行且兩韓關係持續改善強化、北韓透過南韓向美方釋出願意舉行「川金會」意願、時任美國中情局長的蓬佩奧(Mike Pompeo)悄赴北韓會晤金正恩等顯示北韓情勢出現和緩徵象時期。面對美國與南韓已就推進北韓議題轉好強化合作時期，安倍仍積極多次透過訪美、與美國及南韓領袖通話呼籲美國與南韓在對北韓政策上應維持一致極限施壓及重申應實施「完全、可檢驗且不可逆的無核化」(日本外務省，2018)。

而隨著該年 5 月 9 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赴北韓接回 3 名被釋放的美國公民並證實將推進第一次「川金會」及 6 月「川金會」順利舉行，安倍開始調整對北韓政策，表示企盼與北韓舉行「日朝峰會」，並積極與美、中、韓領袖溝通，希望將日人綁架議題納入(日本外務省，2018)，以維持日方在此議題之重要性，並提高「日朝峰會」舉行籌碼。

2018 年 6 月及 2019 年 2 月的兩次「川金會」，美國與北韓因持續無法在「無核化」、解除經濟制裁等分歧上凝聚共識，致使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北韓並再起火箭彈、導彈引擎試驗等低度威脅。安倍則再調整對北韓政策，除譴責北韓，強調絕不容挑釁；並藉 2019 年 12 月之中日本及南韓領袖峰會國際場合，強調應完全履行安理會對北韓制裁案及北韓完全無核化之重要性，有意以此回應中俄同月在安理會提出的放寬對北韓制裁案(日本外務省，2019；中國大陸外交部，2019)，與南韓在北韓政策上再度走向不同路線。

（三）南韓態度

相對日方態度變動幅度，文在寅自上任後均穩定保持對北韓和緩態度，並掌握 2018 年情勢趨緩時，積極推進兩韓關係，舉行 3 場兩韓領袖峰會及簽署多項協議(詳見表 3)。相關操作促成其在各方間斡旋北韓問題，提升其在該議題及區域影響力，獲取「外交利益」。

表 3

2018 年後兩韓領導人會晤情形及重要成果

日期	地點	重要成果
2018.4.27	板門店南韓一側之和平之家	簽訂「板門店宣言」，宣布重啟兩韓交流。
2018.5.26	板門店北韓一側之統一閣	北韓承諾將與美直接談判，同意強化兩韓合作關係。
2018.9.18-20	北韓平壤	簽署「平壤共同宣言」及「旨在履行歷史性的板門店宣言的軍事領域協議書」。

資料來源：整理自韓聯社新聞資料，表為作者自製。

面對北韓情勢和緩及威脅再起，立場均較穩定，最強硬僅表示此有違反安理會決議之虞，此或增加與美談判難度等，其餘除高層未做回應外，則僅稱對北韓威脅表示遺憾，呼籲遵守兩韓「919 軍事協議」；另亦在情勢和緩時，表示願協助安倍促「日朝峰會」順利舉行(韓聯社，2018)。

針對近期北韓威脅再起，文在寅亦仍持續透過外交管道釋出金正恩訪韓、再開兩韓領袖峰會期待，對北韓政策未明顯轉向強硬。而對於中俄在安理會提出的放寬制裁議案，文在寅則保留表示，北韓情勢需各方努力，未若安倍立場強硬(韓聯社，2019；中國大陸外交部，2019)。

(四) 小結

針對第三時期，日本及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因受北韓情勢漸趨緩和但仍有些微升高，日本立場變動相對韓方劇烈。此時雙方因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彼此「共同利益」之差異性，致雙方合作有許多變化。

從一開始情勢趨緩下，南韓因對北韓「威脅認知」相對日本低，且期待從北韓議題獲取「外交利益」，採取和緩立場，而日本則保持強硬立場。而隨著和緩走向穩定，日本開始釋出願舉行「日朝峰會」意願，南韓亦表示願協助日方，日本與南韓政策開始出現協調、一致性也提高。而到近期北韓武力威脅動作再起，日方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及重視「安全利益」升高，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政策再出現較大分歧；惟此一階段日本與南韓因「徵用工」歷史爭議問題致關係急速惡化，日本或南韓積極向另一方尋求在北韓政策之合作、協調則未見。

肆、結論

一、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合作之擺盪

檢視 2012 年以後，日本及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為何無法形成穩固同盟關係現象，在政策上呈現「想像的共同政策」。

首先，日本及南韓形成北韓核武政策聯盟之關鍵是同時具有「威脅認知」與「利益認知」，前者是雙方對北韓威脅具有相同或接近的強度認知，後者則是雙方對於如何看待北韓對於其之利益(區域安全利益、區域議題主導地位)。

就「威脅認知」部分，可從北韓作為及其與日本及南韓關係分別分析。「北韓作為」面向—北韓在 2018 年前的挑釁，相對多是直接威脅日本安全，例如導彈試射落入日本經濟海域、飛越日本本土、針對美軍駐日基地；再加上安倍政府外交政策相對南韓文在寅政府更依附美方，美軍在日本有更多部隊進駐且多使用高科技武器，故不僅北韓對日方態度相對強硬，倘北韓挑釁亦威脅美方時，日方亦傾向採強硬回應。

北韓與日本、南韓關係上，日本與北韓迄未簽署基本關係條約，雙方仍在歷史問題、日人遭綁問題存在諸多難解齟齬，且兩國互信度亦相對更低；而兩韓關係則因雙方為同一民族，政策相對保留，且會隨政黨輪替有不同強度之互信。亦即，日本在對北韓之「威脅認知」部分，相對南韓來的強烈。

「共同利益」部分，日本與北韓分屬兩民族，雙方在歷史上多次為敵對關係，且二戰迄今仍未完成關係正常化談判並建交，致北韓問題之於日本主要的利益在於其對日本本土及區域安全的影響。加上政治體制、分屬國際陣營的差異，日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受制美國，能操作政策空間有限。故北韓對於日本來說，首先在安全性本身即有「安全利益」偏高問題；再者，日方可以透過操作北韓威脅議題，強化與美方同盟或提升其安全政策的自主性(簡要說明請見圖 4)。

而相對來看，北韓問題之於南韓的主要利益則趨於多元，雙方不僅屬於同一民族，且一方面北韓相對日本更願意對南韓釋出善意，並同意讓南韓協助其處理部分外交談判安排。另方面南韓政府亦企盼透過北韓議題操作，提升其在區域影響力，在情勢和緩或左派政府執政下，北韓之於南韓的「外交利益」甚至會凌駕於「安全利益」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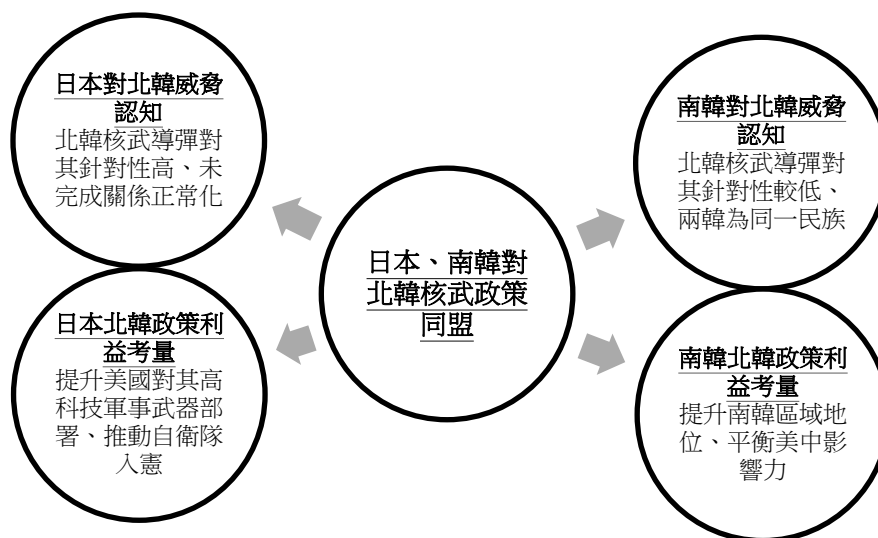


圖4 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同盟受牽制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認為，影響日本及南韓會否在北韓政策合作的關鍵，主要在於北韓對外採取武力威嚇或和緩談判策略。亦即北韓情勢是緊張或和緩影響日本、南韓當下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之認定(變動情形如表4、圖5)。

由於，南韓長期相對日本對北韓「威脅認知」偏低，且「外交利益」對比「安全利益」比日本偏高，故當北韓情勢走向「和緩初期(出現徵兆)」或「緊張後期(走向僵局)」，南韓傾向採取更積極的和緩政策作為，並有意藉扮演美國與北韓談判協調者提升其對外影響力。甚至，在北韓情勢已轉向「緊張初期(出現徵兆)」及「和緩後期(陷入僵局)」，美日並已在北韓政策上趨向合作，南韓的政策光譜上仍較偏好採和緩立場。

而倘北韓情勢轉向「緊張初期(出現徵兆)」或「和緩後期(陷入僵局)」時，重視「安全利益」、對北韓「威脅認知」高的日本則偏好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會積極向美方尋求政策合作；此時日方是否主動向南韓協調對北韓政策，則受雙邊關係好壞影響，惟無論日方是否主動向南韓尋求協調可能，南韓對北韓之政策仍會保持其原本的偏好，受日本影響低。另也由於日本在北韓議題的「威脅認知」高及重視「安全利益」，故在北韓情勢處於「和緩初期(出現徵兆)」及「緊張後

期(陷入僵局)」，美國與南韓加強政策協調性時，日本的政策仍會相對偏向強硬。

又若北韓情勢進入「和緩」或「緊張」的「中期(穩定、仍有再發展可能)」，由於情勢並無轉向另一方向的徵象或已陷入僵局促各方有調整契機，日本及南韓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的歧異相對縮小，故美日及南韓會形成較穩固的政策同盟關係，日本及南韓甚至可能在其中主動尋求政策協調。

表 4

美日韓因北韓情勢變化之合作選擇

期程	北韓情勢	
	和緩	緊張
初期(出現徵兆)	美韓合作	美日合作
中期(穩定、仍有再發展可能)	美日韓合作	美日韓合作
後期(陷入僵局)	美日合作	美韓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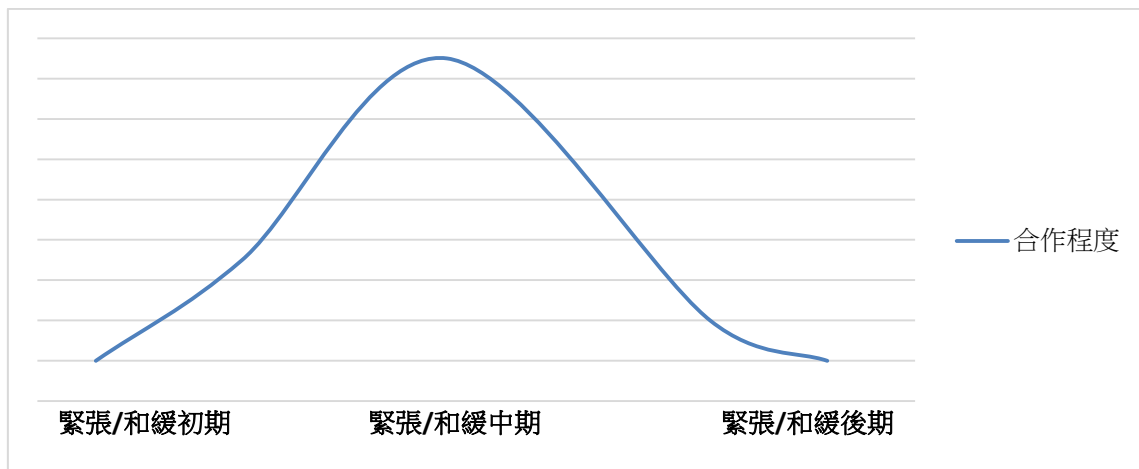


圖 5 美日韓就北韓政策合作波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聯盟理論再思考

總得來說，日本、南韓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界定不同，進而影響雙方就北韓核武政策形成同盟關係，導致雙方對北韓政策為「看似一致，實則分歧」的「同床異夢」。

回到「聯盟理論」角度來分析日本、南韓能否對北韓政策形成政策同盟的問題。從現有理論來看，「威脅平衡」此一聯盟成因雖似可作為分析日本與南韓是否能形成政策同盟，惟觀察兩國就北韓核武政策的合作協調出現的歧異，或應增加思考雙邊之「共同利益」。申言之，北韓核武威脅雖有助兩國基於「威脅平衡」建立政策同盟之聯盟關係，惟因雙方在「共同利益」上難取得長期一致性，日本與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形成的聯盟關係隨情勢變化大，無法形成長期、穩定之聯盟關係。

由於雙方在北韓核武政策上的聯盟關係處於變動狀況，故基於現有聯盟理論思考日本及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聯盟時，或可更深入分析北韓情勢究竟處在和緩或緊張的初期(出現徵兆)、中期(穩定、仍有在發展可能)、後期(陷入僵局)，以及日本、南韓本身對於北韓的「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偏好「安全利益」或「外交利益」)之歧異與變化。透過此些分析，或許才能與「聯盟理論」有更好的對話，更能理解為何日本與南韓在美國安保政策的協調及北韓武力威脅下，兩國對北韓政策仍有諸多差異。

除此之外，從政治社會理論來看，Anderson 詮釋的民族主義指出，民族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為意識形態的建構，透過主觀定義迴避民族的「客觀特徵」。觀諸日本、南韓、北韓各自的歷史，以及韓戰後的國民教育文本，日本與兩韓被視為兩種不同民族的主觀不斷被強化，加上雙方基於對殖民歷史的不同詮釋，更使得日本與兩韓的主觀分立性持續強化。而南北韓雖然因政體分隔致雙方的歧異性拉大，惟雙方仍透過憲法、教育文本、領導人意識、社會輿論等，限制雙方分裂為不同民族的想像可能性。

因此，在日本、南韓、北韓對彼此民族「想像的共同體」之異同影響下，日本將相對南韓對北韓核武的「威脅認知」更加強烈，南韓則會因「民族的共同想像」致使「威脅認知」相對較弱。而日本就北韓議題的「共同利益」將更多侷限在安全層面，相對南韓在北韓議題的「共同利益」則會因兩韓民族「想像共同體」，存在更多可能性，範圍從安全擴及外交面向，導致雙方對北韓核武政策呈現「想像的共同政策」(imagined of common policy)。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2013 年 3 月 8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2013 年 3 月 8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019798.shtml。
- 內閣總理大臣聲明(2016 年 1 月 6 日)。日本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se/20160106seimei.html。
- 文在寅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 年 12 月 23 日)。韓聯社。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191223005900881。
- 文在寅會晤安倍 鼓勵朝日改善關係(2018 年 9 月 26 日)。韓聯社。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180926000500881。
- 文在寅對美提議視朝動向推遲聯演(2017 年 12 月 20 日)。韓聯社。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220000100881?section=search。
- 日本仍保持警戒態勢防朝先發射(2012 年 12 月 10 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10_japan_nkorea.shtm。
- 王逸舟(2002)。國家利益再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160-170。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書局。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原作者：Benedict Anderson)。臺北：時報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6)
- 李昭賢(2018)。土耳其對周邊安全威脅之行為反應研究：威脅認知與國家行為分析途徑。國防雜誌，33(3)，31-51。
- 李景治、羅天虹(2003)等。國際戰略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夏廈(2008)。從威脅認知視角解析伊朗核危機。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52-60。
- 陳麒安(2008)。聯盟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26，133-167。
- 楊雯婷(2017)。從美方觀點看到的美日安保體制—「威脅認知雙層構造」。問題與研究，46(1)，125-182。
- 劉新華、秦儀(2006)。威脅認知：美國對中國發展的錯誤知覺。現代國際關係，6，28-34。

- 藍玉春(1999)。有關歐洲統合的論戰及其實踐：聯邦派 vs.主權派。《政治科學論叢》，11，181-228。
- 張少文(2013)。金正恩時代的中朝關係。第二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國際學術會議。http://cks.pccu.edu.tw/ezfiles/213/1213/img/1023/404712442.pdf。
- 張娟瑄(2019)。自願的孤雛？--北韓、美、中戰略三角孤雛地位的自我形塑與脫離。《國際與公共事務》，11，67-94。
- 日本請中國幫忙解決北韓問題(2011年12月25日)。《美國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japan-china-north-korea-136206378/936483.html。
- 胡錦濤會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011年12月26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t890433.shtml。
- 胡錦濤主席同韓國總統李明博會談(2012年1月9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t894015.shtml。
- 李明博和溫家寶：韓半島的和平穩定是東北亞局勢的重要共識(2012年1月11日)。《韓國中央日報》。https://chinese.join.com/big5/article.aspx?art_id=79170&category=002002。
- 日本官民對朝鮮發射顯震驚與慌亂(2012年12月12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12_nkorea_rocket_japan.shtml。
- 飯島勛訪朝晤金永南「美韓難消疑慮」(2013年5月17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17_japan_nkorea。
- 原野城治(2014年1月17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立。《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hk/behind/100050/。
- 朴槿惠政府成立後的首次韓朝高層會談在板門店啟動(2014年2月12日)。《韓聯社》。https://cn.yna.co.kr/view/ACK20140212000900881。
- 日本為什麼不攔截朝鮮的導彈(2017年9月17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1299920。
- 韓外長：藉平昌冬奧促無核化取得進展(2017年12月26日)。《韓聯社》。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226001500881?section=search。

李克強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2019 年 12 月 23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t1727222.shtml。

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9 年 12 月 23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t1727165.shtml。

習近平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2019 年 12 月 23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t1727035.shtml。

李克強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談(2019 年 12 月 25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t1727876.shtml。

楊恕、王術森(2018)。議題性質、威脅認知、共同利益與「可合作安全」。國際安全研究，2，3-22。

二、外文部分

日米首腦會談(2018 年 4 月 18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3937.html。

日米首腦電話會談(2018 年 5 月 10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2461.html。

日米首腦電話會談(2018 年 6 月 12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560.html。

習近平・國家主席との日中首腦會談・夕食會(2019 年 12 月 23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3_003013.html。

第 8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2019 年 12 月 24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4_005530.html。

野田總理と胡錦濤中國國家主席との首腦會談(概要)(2011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china_1112/pm_meeting_1112_2.html。

- Burke, Matthew M. (2012, March 26) Japan to deploy destroyers, missile batteries ahead of North Korea's planned rocket launch, *Stars and Stripes*, <https://www.stripes.com/news/pacific/japan/japan-to-deploy-destroyers-missile-batteries-ahead-of-north-korea-s-planned-rocket-launch-1.172682>.
- 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August 1981), pp. 490-491.
- Dudley, Richard (2013, April6) US Reinforcing Pacific Defenses to Counter North Korean Threats, Defense Update, https://defense-update.com/20130406_us-reinforcing-pacific-defenses-to-counter-north-korean-threats.html.
- Hirofumi, Tosaki. (2017).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Japan's Deterrence Posture,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www2.jiia.or.jp/en/pdf/digital_library/world/170314_tosaki.pdf.
- K. J. Holsti (198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 Keohane, Robert O. (1988).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 169-176.
- Knorr, Klaus (1976). *Threat Perception*,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Landler, Mark & David E. Sanger (2013, May 8) Obama Backs Policy of South Korea's President on North,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30508/c08park/zh-hant/dual/>.
- Lee, Kitae, Effects of South Korea-Japan dispute on DPRK-Japan Dialogu,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Online Series*(September 2019) . <http://repo.kinu.or.kr/bitstream/2015.oak/10563/1/CO19-18%28e%29.pdf>.
- Liska, George (1962).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Morgenthau, Hans J.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New York : McGraw-Hill, 1985).
- North Korea Missile Testing Databas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TI)*.<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cns-north-korea-missile-test-database/>.

- Rousseau, David L. & Garcia-Retamero, Rocio (2007). Identity, Power, 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5), 744-771.
- Sakaki, Alexandra,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 A Downward Spiral, *SWP Comment*, No.35(August 2019), pp.1-7.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9C35_sk.pdf.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2), 159-201.
- Snyder, Glenn H.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 103-123.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Walt, Stephen M. (1997).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39(1), 156-179.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感謝柯玉枝老師對本文的指導與建議。

收件日期：2020 年 02 月 25 日

一審日期：2020 年 02 月 27 日

二審日期：2020 年 04 月 21 日

採用日期：2020 年 04 月 29 日